

新夸父追日与文化寻根

——评贾文成的《太阳部落》

□刘大先

“在《太阳部落》中，无论是现实里的市民与教授、历史上的将军与文士，还是传说里的巫师与奴隶，都可以称之为不同时代的夸父，他们显示出一种对于梦想的追求”

进行拼接、构想与推理，进而建构出历史叙事相似的是，小说通过现实、虚构的文本和悬想的过去，构造出一个关于在大地上生活、行走和追寻的族群。那个族群被称为夸父族，他们战斗、求索、失败而百折不挠，可以视为今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精神寄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太阳部落》是一部新时代的寻根之作，寻找地方、族群和文化的血脉根基。

寻根文学可能是1980年代文学延续至今没有消磨、反而重新绽放出新异之花的思潮。与先锋文学留下的形式上的遗产内化在后来的表述中不同，寻根文学更多的是在观念上的传承。如果说当初的“文化热”和“寻根文学”带有改革开放时代西学涌入的“冲击—反应”痕迹，新时代的寻根则是全球化作为既成事实后的文化自觉和自信逐渐确立的整体性思维转型。这一点折射在《太阳部落》，就体现为一种新的神话式表述。

与上世纪80年代以边疆或文化为主体的写作相比，《太阳部落》并不意在进行文化反思或者书写某种文明论寓言，而是将本土文明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价值所在。考察小说中现实人物的行为动机，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冯晓椿还是吉雅都不具备功利意义上的驱动力，尽管他们也遵守老者的叮嘱，但那不足以支撑他们不计利害、不假思索地加入寻找古城的事业之中。唯一可以解释的是，他们是象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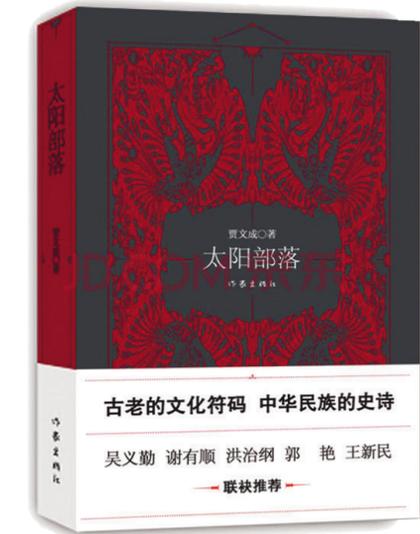
的、精神性的人。小说还专门设置了一个从北京到草原来寻找生命意义的王远京，表征了物质富足后的精神寻求。

这些现实中的人映照那些远古的在大地上求索的人们。他们是被称为夸父族的人们，是行走在天地间的巨人，其恩怨情仇、忍忍品质与性格缺陷都鲜明异常，为了理想而不懈追求。显然，这是一种对于神话的新解，或者说夸父追日原型叙事的当代显现。“一些寓言，尽管延续了千年，但他们从未消失，就像灵魂。”那些文化中具有母题意味的核心意象和故事，一代一代经过移形换位的重写，以不同的面目呈现给不同的人。变动的只是外在的皮相，而内核始终如磐石般稳固。

在《太阳部落》中，无论是现实里的市民与教授、历史上的将军与文士，还是传说里的巫师与奴隶，都可以称之为不同时代的夸父，他们显示出一种对于梦想的追求。就像神话里追日的夸父殁于半道一样，小说里不同时代的夸父们也多多是赍志而没的失败者：李陵兵败，苏武被困牧羊，萧扶桑东渡时死于海上，夏维溪的考古成果被森林林秋雁剽窃走，而冯晓椿在找到宝藏时却功败垂成被杀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生命的意志显现：正是在那种踔厉奋发、殒身不顾的过程中，才显示出其意义。

在神话重述中，作者显示出强有力的整合与虚构能力，营造出巫风弥漫、恐惧凌厉而又不失壮怀激烈、昂扬雄壮的笔调。这是一部写意化的小说，而非故事化、情感化的作品，贾文成更多着意于意象的塑造和意境的营构，如同造型艺术，很多时候的描写不由得让人想起第五代电影，如《猎场扎撒》或《黄土地》里的场景。值得一提的是，小说还常用闲笔、调侃或者说虚拟西方历史的段落，打开了历史叙述的场域，让人不免会心一笑，这表明我们时代的写作者已经有足够的自信站在本土立场上，叙述世界历史和总体性的人类图景。

于此，我们可以回到文章开头我提到的关于我们时代文学的功能的问题。我们阅读这样的作品，似乎并不能带来知识的积累和经验的增进，却可以带来情感的激荡和精神的提振，从中窥测到人类生命意志的显现。置入到新时代的语境之中，尤为具有一种文化传承赓续、拭旧如新的意味——只有不断地回溯文化的源头，一次次地重新发掘原点及其源流，才能波瀾自阔，开拓出新的境界。



当我们谈到文学功能的时候，往往会说到它的审美、娱乐、教育、认知、宣传等诸多关涉层面，但这只是就理想状态而言。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能从一个作品的阅读中获得什么，在信息爆炸、节奏加速、艺术形式选择多样化的时代，愈加成为一个问题。带着这样的问题进入贾文成的《太阳部落》，就显得尤为意味深长。

这并不是一部特别容易读的作品，无论是篇幅还是结构，乃至语言，它都显示出某种强烈的探索气质和象征意味。从情节上看，它的主线由侏儒冯晓椿的亡灵记忆展开，他是跟随着考古学教授夏维溪、朋友吉雅等人在瓦莱湖寻找古城遗址的过程中被害的。但是，通过冯晓椿的阅读和夏教授的破译解码，又衍生出多条叙事线索：大汉帝国远征中的李陵和苏武故事，殷商时代的先人求索太阳历法的秘密并在大地上驱驰奔走，近代殖民者进入瓦莱湖和杭乌盖草原的探险……它们通过意识流动和情节交织几乎无缝衔接在一起，也造成了情节的时空杂糅与枝蔓丛生。

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穿插，主观代人与旁观的零度叙述，让《太阳部落》的语言和叙述充满了先锋小说在涉及历史时常见的含混氤氲的氛围，并由此生发出理性与迷狂共生、日精神与酒神精神交错的风格。只是与新历史主义小说常见的解构宏大叙事不同，《太阳部落》更多倾向于建构某种精神图腾。与考古这一通过历史流传物的断简残片

总有一只猫躲在生活里

——倪苡小说集《女人和猫》读札

□周荣池

猫是许多文人的爱物，它自主、孤独、傲慢，自带读书人因敏感而生的独特气质，人们大体上也希望借此获得某种疗愈。倪苡的小说集《女人和猫》收入15个短篇小说，许多地方直接或间接提到猫——或者你可以在一个蜷缩在沙发上的女人身上看到一只总是存在的猫。这让她的小说大体存在着某种共同的精神意味，一种基于女性作为弱者的、孤独的、撕扯的、令人疼痛的意味。这样的小说令人觉得，她是用出世之心体验人世的艰难或喜悦，这在诸多的讨论家庭生活与两性关系的小说中是别具一格的。

在倪苡的小说中，女性总是伤情和被动的，她们多以悲凉和胆怯的形象出现。这从作者赋予女主的名字中就可窥见其用心：《女人和猫》中的小逃、《失语》中的李小余、《后窗上的爬山虎》中的乔一凡、《蓝色笔记本》中的汪月、《仙人球》中的杭辛——“逃”“余”“凡”“月”“辛”这些字眼都没有一点热烈或者喜色可言。它们构成了一种逃避、孤独和冷漠的群像，又都有一只猫在品行上的共性。这不是偶然的暗喻或借代，是作者特意营造的独特气息。在小说文本的现实里，这些女性无不遭遇着艰难与不堪，又都以某种无奈而又无效的态度抵抗爱情或婚姻的苦痛。这也是时人精神上真实的病痛：小逃要逃离的是一个精神失常的男人；李小余面对的是丈夫的冷暴力；乔一凡面对的是“高光”丈夫背后的自私与薄凉；汪

月似乎强大一点，但为了遭遇牢狱之灾的男人，她选择嫁给权贵作为代价解救了爱人；杭辛虽然获得了离婚后自由的“胜利”，但最终仍要守着一副病痛的皮囊。这些女性都有着说不尽的悲凉。作者塑造这些女性形象的时候，不是基于女性独立或者觉醒意识，而是明确地用某种传统的令人悲情的“妇德”维系着她们的精神世界，这种隐忍有着十分清晰的现实指向。这些故事无不有着撕裂感，“不像”生活的表象，却十分精确地描摹出世相的本真与实情。小逃之所以逃不走是因为丈夫腿断了，更重要的是她心里觉得没能给其生儿育女，尽管小说结尾戏剧性地道出了男人的无能；李小余走不出那一步是因为孩子，因为孩子是最重要的理由，丈夫甚至当着孩子面那她；乔一凡面对丈夫外遇留下的伤口，以及他藏在诗集中的女人头发，仍然选择沉默，甚至有自怪无能的某种愧疚；汪月则完全为了爱情赴汤蹈火，用放弃爱情成全爱情；杭辛在完全被打败时，仍然选择守护不再意味着婚姻或爱情的病体。所有这一切都是悲剧，又是真实生活中的无奈映照。作者内心坚持的是某种理想国一般对婚姻和爱情的向往。这些故事无不都有郎才女貌的开端，又都有着貌合神离的结局——但这并不能怪罪作者，是可能比小说更不堪的现实打败了女性的梦。她们仍能以一种“完美主义”的心态维系难得的

美好，其中有令人悲情的强大。作为小说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小说中的男性都以一种别具幽默实则不堪的形象出现，他们总貌似“高光”地占据着上风。《失语》中的王冬、《后窗上的爬山虎》中的李涛、《女人和猫》中的丁刚、《蓝色笔记本》中的夏荣、《仙人球》中的鲁一涵等，这些男性名字看上去就很普通或者随意，放在一起更可以看出作者作为女性的“别有用心”。她是用这些看似普通却实则有的设计，表达对男性的明确态度——他们看起来衣冠楚楚又颇有建树，因为地位、金钱等对女性有某种强势，但他们对于初心和现实而言，有着无尽的不堪。王冬出轨，又哀求李小余不要声张；李涛是学术名人，但与几个女子有染，还伪装高大“人设”；丁刚连一碗面条都不会下，却虐待猫、威胁妻子，最后断肢失能；夏荣被判刑三年，靠的是女友与权贵结婚减刑释放；鲁一涵生意风生水起，偷偷在外生了私生子，却因为病体被第三者抛弃，最终是离婚后的杭辛收容了他的残生……这些情节有失真的地方，这种失真可能是因为作者还没有狠心将结局写得更加不堪。最终，这些貌似强大的男性被猫一样敏感柔弱的女性所容忍、收留与拯救，女性们用悲情在做入世间喜悦的事情。

倪苡善于利用细节修辞，这是小说技法上别具一格的地方。我们看到了许多饱满诚意的句子，比如：李涛闪电般地将那缕头发扔了出去，他恐惧的模样像是在扔一

美好，其中有令人悲情的强大。

作为小说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小说中的男性都以一种别具幽默实则不堪的形象出现，他们总貌似“高光”地占据着上风。《失语》中的王冬、《后窗上的爬山虎》中的李涛、《女人和猫》中的丁刚、《蓝色笔记本》中的夏荣、《仙人球》中的鲁一涵等，这些男性名字看上去就很普通或者随意，放在一起更可以看出作者作为女性的“别有用心”。她是用这些看似普通却实则有的设计，表达对男性的明确态度——他们看起来衣冠楚楚又颇有建树，因为地位、金钱等对女性有某种强势，但他们对于初心和现实而言，有着无尽的不堪。王冬出轨，又哀求李小余不要声张；李涛是学术名人，但与几个女子有染，还伪装高大“人设”；丁刚连一碗面条都不会下，却虐待猫、威胁妻子，最后断肢失能；夏荣被判刑三年，靠的是女友与权贵结婚减刑释放；鲁一涵生意风生水起，偷偷在外生了私生子，却因为病体被第三者抛弃，最终是离婚后的杭辛收容了他的残生……这些情节有失真的地方，这种失真可能是因为作者还没有狠心将结局写得更加不堪。最终，这些貌似强大的男性被猫一样敏感柔弱的女性所容忍、收留与拯救，女性们用悲情在做入世间喜悦的事情。

倪苡善于利用细节修辞，这是小说技法上别具一格的地方。我们看到了许多饱满诚意的句子，比如：李涛闪电般地将那缕头发扔了出去，他恐惧的模样像是在扔一

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塑造与复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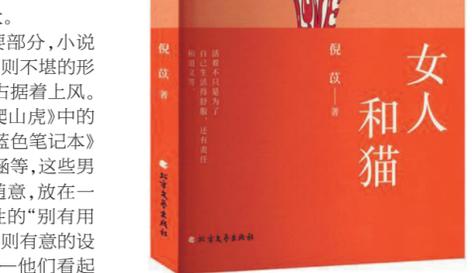
——评胡松涛的新作《嫫祖》

□王久辛

当代经典，含后记，凡二十章，每章每节，均为源有出处的想象，是落地生根又暗吻香草蕙蕙之大地想象与写真，如诗如画，许多章节如华彩乐章，不仅动人心魄，而且美不胜收。

读《嫫祖》，我想到了《一千零一夜》《十日谈》《山海经》等元典之著，虽然胡松涛写的是轩辕黄帝的元妃妻子，但那位始终与轩辕大帝一起生活的女人嫫祖的所作所为，尤其她为人初祖的所言所行，包括她做人做事的恭谨敬畏与勤劳智慧的心细如发，她的发善于心的点点滴滴，都弥漫出理想的人格魅力。胡松涛的写作证实了一个传说的真实存在，又复原、弥补、增添了一个真正活得有价值、有意义的人。嫫祖已逝四千多年，但胡松涛的写作完成了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塑造与复活，他把自己虔诚的尊崇与敬仰，完全融入在对嫫祖深挚逼真的冷静写作中。

在50多年的光阴里，胡松涛一直在嫫祖的源头浸淫习性，尤其当他准备书写嫫祖时，所有读过的书中涉及的关于嫫祖的只言片语，都被这个有心人一一捡拾净尽并有条理地刻写在自己的著作中。他不是读人家的书，依人家、寻人家、照人家的路子叠生想象，写一些别家派生出来的东西；他不屑于写那样的东西。尽管胡松涛也读《史记》《资治通鉴》《山海经》等，读古今中外各类典籍杂书而生出创造性冲动，但是他的读是“归于一”的读，即他把读来的史实与见识、念想与想象，和自己写的故土、故情与故人紧密联系，归于、融入、创于嫫祖。这就使得他的创作具有了个性化与精神化的统一。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松涛作为嫫祖的同乡，能够自始至终把自己读到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统统收集起来，汇总贯通，上溯源头，生活习俗与语言习惯融汇一



条突然掉在脸上的死蛇；可以看见叶片上有如同少女脸上的细小茸毛；可这漂亮的字像鸟喙似的一下一下啄着她的心……作者像一只敏感的猫，从生活中获得了生动感知。还有猫的意象在小说中几乎随处可见，即便只字未提，又似乎总有某种明确的意境引导读者去引申和想象——总有一只猫躲在生活里。在《失语》中，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叫“猫”的女人；《女人和猫》中有两只叫“汤圆”的猫；《张小元的爱情》中那个古怪的男人“养过一只黑猫”；《苏娜的夜晚》中苏娜的念头“像街头的流浪猫”；《后窗上的爬山虎》中，乔一凡“像猫一样躺在沙发上”……最为有趣的是在《失语》中，母亲劝女儿不要离婚，用了这样一句俗语：天下没有雪白的猫。这些都是作者从生活中习得的，证实了生活可能比小说更加艰难，但又还是生机勃勃的。

从战士到指导员、教练员、政治处主任，咏慷一直在空军，还曾作为全空军的先进典型被宣传过，又是从空军调到解放军原总部机关的，所以作为空军组织部的老领导，我多年来一直关注他的创作。咏慷的创作有很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乐于深入生活，敏于学习思考，勤于创作实践，几乎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就会有一部沉甸甸的新作问世，因而被不少人称赞为“文学创作的‘劳动模范’”。

近年来，我读过咏慷不少各种形式的作品，并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评介过其长篇小说《东江剑魂》。最近，我又高兴地读到他的长篇小说《南泥湾》。这部小说颇具匠心，独辟蹊径，没有单纯地写大生产，而是把大生产推向背景，把人作为生产、战争的主体来探讨人生，以确实存在过的专为开垦南泥湾而成立的八路军359旅补充团为史据，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以奉命开发南泥湾的“先遣队”为骨架、线索、流程，再现了从延安时期开始的几十年斗争风云，浓墨重彩地描摹了林林总总、鲜为人知的事件，精心刻画出身份不同、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可以说，这是一部能够给人以深刻历史感悟与精神启迪、具有独到特色与艺术品位的长篇小说。

《南泥湾》填补了开垦南泥湾的来龙去脉和艰辛重重的奋斗历程。凡是跟南泥湾有关联的内容与场景，小说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史实。这从两方面昭告与启示世人：首先，虽然时代不能选择，然而人生之路，既是时代的赋予，又是每个人的一种主动选择；其次，时代向前发展需要调动、释放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是各条战线正能量的融合共振。无论哪个时代的青年，无论他所处何地走向何方，南泥湾先遣队及其代表人物雷达明、苗巧萍等的足迹与精神，都会使其受到感染与激励，都会使其懂得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是头等重要的，理应担负起责任，尽心尽力。《南泥湾》既是典型的军旅题材作品，又是超越了军旅题材自身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青年题材的成功之作。

在人物塑造上，《南泥湾》呈现出一种多维视角与多维的性格特征，全书人物有姓名者数十人，其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定位及其创造确有可圈可点之处。如雷达明的忠勇、苗巧萍的真诚、姚玉清的敬业、庞冬梅的睿智、章君曼的干练等，都能给人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在作品中抒写普通人的命运与追求，抒写广泛的大多数，应当说是作家、艺术家真正的写作价值，也是其作品有意义的根本所在。

南泥湾先遣队中的人物出身各异、经历不同，部队指战员多是穷家子弟，而在知识青年中又多是生活富裕家庭的子女。他们中有那个时代对“进步与光明”的向往者，也有因“逃婚”而对“平等自由”的追求者，当然还有怀着“个人野心”而被各个敌对派系派遣的特务。这些人无论出于何样的目的和动机，都是那个时代“偶然中的必然”。而他们后来的人生之路，或成为心胸更加开阔、目光更加深邃的成熟革命者，或由普通农家子弟锻造成革命队伍中的骨干脊梁，或在革命大潮的洗礼中由原先的“敌特”因“彻悟”而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或受原有世界环境和具体环境所困，始终不能自拔，成为社会“垃圾”。这也是那个时代“偶然中的必然”。苗巧萍、雷达明等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他们不仅是民族的脊梁，也是时代、社会真正需要把财富与道德统一起来的中坚。

这些人物形象还提供了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思考与感悟——时代决定人生，时代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人生，隐喻其背后的“共性”却是世人应当深刻理解与把握的人文景观。在这点上，《南泥湾》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回答。它不仅为普通大众的一点上之梦，也折射出时代最大数量平民之心态、理想、愿望、思想道德的一种张扬和深化，特别是作者把无限的时空凝聚在苗巧萍、雷达明这些战士身上，使之成为大生产运动的灵魂。

文艺作品抒写人的心灵，抒写寒冷中的温暖，抒写向往与遥想，永远都是作家所应秉持的立场与观念。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说过，“作家应该是一名水手”。水手是要远航的，但无论怎样远航，航船终究要靠岸。也就是说，无论怎样放飞想象的翅膀，一定都要脚踏实地的大地。

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以来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战斗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后人永当铭记。《南泥湾》以主人公的人生奋斗足迹为主线，从开辟南泥湾到新疆屯垦戍边，又到开发建设“北大荒”，再到开发南海、人工造岛，从自己到儿女子孙，一代接一代地奉献于党、祖国和人民，反映出中国的历史变迁和他们坚持的人生态度，展现他们的人生情趣和追求的人生价值，这可称为直接的“艺术熏陶”。

近年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不能不承认，经济的繁荣和物质的丰富，未能填补一些人思想上的空虚和精神上的失落，对金钱的追逐和对享乐的向往，使人们失去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价值观的多元化和混乱局面造成了青少年价值观选择无所适从的情况下，推出《南泥湾》这部具有核心价值取向的长篇小说，褒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重建信仰的大厦，唤回信仰的力量，如今显得尤为重要。



起，展开合理想象与创化，写出一个具有乡土中国理想人格的典范式文学形象。在我看来，这是这本书最为可贵的地方。